

普遍交往背景下文化认同的生成逻辑探析

林 辰

摘要：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和社会现象自古有之，以“我是谁”“我们是谁”等身份追问为标志的自我意识觉醒，反映了特定主体对自身文化及自身归属的初始认同。近代以来，民族国家间普遍交往的展开使得文化认同问题凸显，文化的民族性与人类性张力日益突出，文化主体间的撕裂与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认同危机使得文化认同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从传承中的文化体认、比较中的文化自觉、发展中的文化建构层面考察普遍交往背景下文化认同的生成逻辑，有助于摒除简单狭隘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内在机理层面考察当代文化认同的反思与重建。

关键词：普遍交往；文化认同；生成逻辑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2)05-0117-05

一、问题缘起：普遍交往中的文化冲突与认同危机

文化认同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突显出来，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间普遍交往的展开紧密相关。“交往”一词最初是指人们的相互往来与联系沟通。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们的社会交往进行了系统考察。由此，交往作为一个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开始为多个学科、多个领域所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一种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交往概念。在他们看来，交往包括了个人之间、团体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一切往来。一定意义上，人类社会正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形成的。

历史地看，人类社会的交往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最初是同人与自然的联系一起发生的，他们都来自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人们在对自然的改造过程中，意识到与他人来往、合作的必要性，

从而觉知到人的生存是发生在与他人的交往之中的，这种发生学意义上的交往形态被理解为一种“人的依赖关系”。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打破了以往原发形态的交往模式，确立了人类社会新的交往形态。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资本的逻辑把各国各民族的人们联结起来，以往自给自足的状态已经被人们的普遍联系和高度依赖所取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空前发达的社会分工与人们间的彼此依赖同时存在又彼此矛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表现为一种中介关系，人们的生活日益变得外在化与孤立化。此时的交往关系呈现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正因如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的矛盾所引发的人与社会的对立，需要且只能通过对分工的克服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从而实现一种理想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对此，

本文为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2年度课题“全媒体时代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挑战与应对策略”(SZ2022C005)；深圳市社会科学院2022年度专项科研课题“智媒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引导机制创新研究”(2022AC005)阶段性成果。

赫斯也曾指出，社会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居于重要地位，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要素。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则体现了人之为人的最为重要的类本质。现实中，普遍交往的扩大以及其间产生的异化现象引发了不同层面的认同危机。

首先，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紧张。人与自然之间认同危机还可以扩展到“物质”与“精神”的种种紧张关系。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人们经常处于“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困境之中：一方面，人们将物质追求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甚至将物质追求本身当作是一种意义。另一方面，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多，人们越来越感到意义和价值的缺失。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物质的充分流动，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纷繁复杂、应接不暇的商品。这种由于无意义感而引发的主体内心的焦虑引发了文化认同危机。

其次，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危机。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身份感降低、焦虑感增强是文化认同危机的重要表现。文化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文化和既有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怀疑和批判，以外域思想文化取而代之”。^[2]塞缪尔·亨廷顿从文明冲突的角度理解文化认同，指出人们常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如旗帜、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等。^[3]在他看来，在文化冲突的环境中，主体必须有自己的特殊性，“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是人们确认自我身份的根据，文化象征物是进行自我身份确认的标志。同时，在文化认同危机中，主体对于自我的理解，往往会经历复杂的调整。

再次，文化断裂及群体意义危机。对于文化认同危机缘何成为一种普遍性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进程引发的文化间的碰撞和冲突是其直接原因。一方面，全球化的展开和现代性的扩张引发文化冲突加剧，一定意义上“造成了文化断裂”。^[4]从文化的演进来看，文化传统的积淀需要较长时间的延续，而现代性对于传统的批判和否定在某种意义上带来了历史和文化的断裂，这种革命性的力量也成为构建新的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更为频密的文化交往和文化传播，多元异质的文化得以有机会存在于共时性的时空场域之

中，带来了文化经验的多样性和文化选择的丰富性，为人们提供了反思自身文化传统的参照物，也使得人们评判文化的价值尺度和价值标准发生变化。

最后，社会结构调整及其引发的不同群体间、不同个体间的撕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有经典论述：“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5]这种社会秩序的紊乱以及社会安定感的丧失使得人们常常陷入无所适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曾以法国社会为例，讨论了社会结构变化这一问题，他把这种变化形象表述为从原有的金字塔结构向一场马拉松赛转变。宏观层面，民族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的时代落差被不断拉大。中观层面，同一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在影响生存状态的诸多指标（如收入水平、消费能力等）间的差距也在不断加大。微观层面，一个群体内部之间，如一个组织内部、一个家庭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立场、判断和目标发生分化。在这样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期，由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而引发的认同危机，表现在信任的基础被动摇，认同的标准不再有效，以及人的归属感、意义感的迷失。不仅如此，文化认同危机的影响不仅仅在文化领域，往往会传导到其他领域，成为引发政治动荡和社会危机的深层因素。

二、历史逻辑：传承中的文化体认

文化的传承性和异质性是文化认同发生的历史前提。历史地看，文化认同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自发的文化认同是指前全球化时代个体对于群体内文化的归属感。此时的文化认同表现为对群族文化的历史与当下张力的理解。一方面，个体总是处于积淀而成的群体文化的熏陶、影响和塑造之中。另一方面，由于人的超越性本质，处于特定文化现实的人总是以反思和超越的方式，构建新的文化。自觉的文化认同是指群体间的文化在充分交往、相互影响下，文化环境进一步多元和混杂，个体的视野不再局限于群族或民族国家内部，选择也进一步多样和多元，由此引发的对文化传统的体认和对异质文化的评判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第一，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体认。这里的文化传统不仅是过去的、逝去的文化。文化处于流淌、变化之中，与之相应，文化传统也始终处于生成和演变之中。以中国为例，当下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应该仅仅狭隘地局限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导，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已经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正因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决定“文化”的性质和方向的前缀，并不是简单的、字面意义上的修饰，而是一种本质规定。这种本质规定本身包含了不断引导和塑造新的文化传统的动态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不是社会主义文化，而割断了中国文化传统就没有中国特色”。^[6] 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为什么能够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并不断结出丰硕成果？从理论上讲，就在于其超越时空、超越国界的科学性和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内在包含了其广阔的理论视野和深刻的现实关怀，也正是这两方面的相互映照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的思想主张能够以超越时空局限的思想穿透力洞悉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以思想与实践双向互动的方式，一方面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另一方面不断地现实地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正是以深度参与实践的方式在中国大地生根，进而构建新的传统的过程。

第二，对特定文化归属感的体认。从个体与群体以及群体间文化认同的生成过程来看，主体对于某一文化的认同总是基于对这一文化的心理归属感。对此，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在《认同的空间》中指出：“欧洲委员会鼓励节目制作人吸引广大的欧洲受众”，其意义在于通过有吸引力的节目来培养普罗大众的“归属感”，进而以“共同文化的认同”来“重振欧洲自信心”。^[7] 这媒介视角阐释了增进归属感的意义。也即是说，文化归属感对于文化认同的生成具有某种基础性作用。这里的文化归属感，不仅局限于主体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归属心理，也可能对于未来文化的某种想象、向往和

建构，或于其他异质性文化的某种心理归属。

第三，对于异质性文化的体认。从认同的角度来看，差异性文化的鲜明对比，往往更能够激发主体强烈的自我意识。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历史地看，世界上许多民族和国家都曾有过把自己的文化作为某种“典范”和“标准”向其他国家或地区特别是殖民地进行复制、推广的努力和尝试。这些努力和尝试背后往往是强势文化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文化主张和价值理念重塑世界。在不同文化共同体相互博弈的过程中，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意识形态的部分始终是影响各方综合实力的基础性要素。从某一文化共同体内部来看，能够处于主导地位、反映时代精神、引领社会趋向的文化往往具有某种现实的社会号召力和凝聚力。这种社会号召力和凝聚力的背后是文化权的掌握和运用。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掌握两种领导权，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相比而言，后者特别是其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深刻影响社会认同的关键，也是影响政权的关键。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的生成，背后往往伴随着异质性文化的激烈冲突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正是在异质性文化激烈冲突、相互博弈的过程中，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会直观地感受到文化冲突所带来的价值失范和认同危机，特别是在这一情形中处于弱势的一方，面对强势文化的渗透和扩张，往往会被动地激发出某种强烈的文化体认诉求，也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体认中，文化的认同感也随之生成。

三、现实逻辑：比较中的文化自觉

以“我”为主体所形成的意义构建往往是在“我与你”或“我与他”的对比中突显的。比如“我是谁”往往是在“你是谁”“他是谁”的参照中获得意义的。也即是说，身份自觉在多数情况下是处于某种隐形状态，而当“我”之外的主体出现，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同”和“异”成为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区分的重要参照。比较往往是在同“类”进行中才有意义，发生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认同问题，也是由主体之间“类”的相同、相近，以及“象”差别差异共同决定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研究指出：“从古至今，欧洲的身份特性都是相

对于美国、伊斯兰世界、日本乃至东方来界定。”^[8]可见，参照系统和参照对象是比较的前提，也是比较中实现文化认同的基础。

首先，文化差异是文化认同的前提。如果说，文化认同的主体在认同活动中体验到的是对具体的文化理念、文化模式和文化样态的肯定和认可，那么，这种倾向性的肯定和认可大多数时候是自发的而非自觉的。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借用索绪尔的观点说明了这一观点。按照索绪尔的理论，“语言的王国里只有差异，不存在正面的关系。因此，他在分析语言中的同一性问题（指两个语言单位被算作同一范畴下的实例）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同一性完全是一个系统内的差异功能”。^[9]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将索绪尔的这一原则应用到了文化认同领域，他们指出：“与其一个个地分析文化（或民族）认同，（有可能）随后思考它们是如何相互（以结盟或敌对，主宰与隶属的关系）联系的，不如我们牢牢抓住索绪尔所称的这些‘同一性’是怎样只有在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当中且只有通过它们互相间的关系构成。”^[10]比如，欧洲文化正是在于美洲文化、亚洲文化、伊斯兰文化的比较中构建起独特性的。换言之，正是差异构成了认同。

其次，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历史地看，文化从孕育到成熟，必然有一个代际相传、不断累积、不断创新的过程。对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来说，越是在文化间交往不频繁、联系不紧密、影响不明显的前全球化时代，这一地区、民族的文化演进越缓慢。从文化更迭的动力机制来看，在外部动力不足刺激不够的情况下，文化内的改革和创新动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文化传统的严重制约和阻滞，此时无论在发展速度还是在发展方向上，相比而言，都没有外来文化所刺激和引发的文化融合更为高效和直接。因此，文化在传递过程中，既有“纵向的继承”，也有“横向的开拓”，这两方面包含了文化内新旧文化的演进更迭以及文化间的内外文化的相互渗透，而横向开拓也展示出其尤为重要的作用。

再次，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同场竞技。一方面，全球化为各个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在当代，即便最为保守的国家也无法否认

全球化的影响，与此相对，即便最为开放的国家也无法完全抹去自身的文化胎记。从内部环境看，全球化进程是不同文化群体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的趋同过程。这种趋同性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等多种方面，是一种复合性的趋同，每一区域、每一民族的文化特色，都因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展开和深入日益成为人类“地球村”的共同资源。特别是交通和通信手段的不断迭代发展，使得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有机会成为人们的关注点和兴趣点。另一方面，不同地区间的竞争也愈发激烈。全球化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区域文化整合到同一时空维度、同一体系之中。尽管全球化的趋势显而易见，人们都有直观的体验，但这种带有强烈竞技色彩的一体化进程，以及背后所暗含的趋同倾向，往往会遮蔽或消解某些地方特色文化。

最后，强势文化的扩张和渗透。有观点表达了这种因强势文化输入而引发的普遍担忧：“如果说全球化进程激起了人们的恐惧和不满情绪的话，那么这些情绪绝大部分往往会和人们已经觉察到的来自美国文化和‘美国化’的威胁有关联。”^[11]在许多人看来，强势文化的不断扩张和渗透将深刻影响相对弱势一方面的文化建构。比如余英时先生在《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一文中曾提出“嫉憎交织（Ressentiment）”的一种心理状态，来描述后发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一种羡慕与厌恶相互交织、彼此纠缠的复杂情感。西方国家的民族认同史上，“嫉憎交织”的影响相当普遍，比如法国之于英国等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子。这种情况在东西方文化相遇时表现得较为突出，西方强势文化以普遍主义姿态进入，使得后发国家在情感上受到侵犯，在利益上遭到触动，在发展空间上受到挤压。这种境况激活了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自主自觉意识，尤其是受到殖民和半殖民侵袭的地区，人们开始就自身文化传统进行反思，考察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或隐或显、无处不在的深刻影响，由此而产生了激烈的文化冲突并深刻危及了后发国家的文化认同。

四、价值逻辑：发展中的文化建构

在文化认同活动中，价值评判伴随始终。一方面，主体对文化的认同与否，总是在主体既有的、

当下的价值坐标体系下进行的,包括具体的评价尺度、参照标准等都是深刻影响主体心理活动和认同结果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主体文化认同的生成,总是以能够反映主体认同活动的新价值观念为标志。因此,有必要从价值的角度分析文化认同的内在逻辑。

第一,文化认同生成的前提是主体价值意识的觉醒。异质性文化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差异性价值观念对文化传统构成了强烈冲击。在与异质文化相遇的过程中,文化总是处于某种“参照”之中。一方面,这种参照可能会引发主体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进而对自身文化传统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另一方面,这种“参照”也可能会激发主体的自我改进更新意识,进而以接纳外来文化、替换现有文化的方式,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某种替换和改造。在这一过程中,价值判断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换言之,在异质性文化的交往过程中,价值意识的觉醒是主体作出判断和选择的重要前提。同时,异质性文化的相互借鉴为彼此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

第二,文化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观认同。无论对个体还是群体来说,价值观形成对于文化认同的生成都至关重要。对个人来说,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内在价值体系是深刻影响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对群体来说,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是深刻影响家庭、社会风尚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因此,从价值的角度剖析文化认同的生成逻辑,需要对个体与群体的心理活动与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作进一步的分析。概而言之,实现主体的文化认同,需要从社会核心价值层面对整个主体所处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现有文化资源和未来发展方向作出引领和示范,进而通过核心价值的塑造和规范功能统一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并逐渐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价值风尚。这一过程,也是文化认同逐渐生成的过程。

第三,文化认同的关键是有效整合多元价值。世界范围的文化流动正深刻改变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格局,人类已经成为休戚相关的命运

共同体。历史地看,每一繁盛的文化形态总是在不断地包容、借鉴其他文化形式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自身的,总是在与异质性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中传播和推广的,正是在不断地包容“他者”^[12]的过程中,激发和调动自身活力的。“他者”不仅是确证自我的必要参照,同时也是丰富自我、完善自我、成就自我的重要动力。当前,在全球化不断走向纵深的时代背景下,构建合理化的当代文化认同,就是要抛弃“文化中心主义”的宰制性思维,摒除简单狭隘的“二元对立”思维,进而超越“单一性”的文化认同形式,形成多层次的文化认同策略,即以本民族文化传统为基础,积极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先进成果,以人类情怀为理想指向的“复合性”文化认同。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 [2] 赵剑英.文化认同危机与建构社会基本价值观的紧迫性[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2):87-91.
- [3] [美]塞缪尔·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4-5.
- [4] 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02-107.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35.
- [6] 陈先达.关于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下)[J].高校理论战线,1995,(11):28-33.
- [7][8][9][10][11] [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司艳,译.认同的空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3-4,1,60,60-61,24.
- [12] 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序3.

作者:林辰,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周修琦